

【法 学】

雅典的民主制度及其局限

蒙振祥, 叶晓川

(西北政法学院 法学一系,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雅典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 雅典民主制具有“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鲜明特色。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雅典; 城邦; 民主; 直接民主

中图分类号:DF 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3) 01-0081-05

西方的直接民主制起源于古代希腊, 而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则是古代希腊的典范。民主在古希腊语中是“人民的统治”之意。雅典“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 民主共和国, 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1](P 115), “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 以后让位于由 9 个执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 9 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 全部属于贵族。”[2](P 205) 后来经过德拉古(Dracο)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 终于在雅典确立了民主制度。

一、雅典民主制解说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 个人的统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3](P 169), 因而主张“法治”。梭伦说:“我制定了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法律, 为每个人规定了公正的正义。”[4](P 73) 伯里克利说, “在我们私人生活中, 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 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 我们遵守法律, 这是因为这种精神深使我们心服。”[5](P 130) 在雅典, 每个官员任职前必须宣誓他将公正地和依法地从政。雅典人视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任何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包括 10 将军在内。公元前 5 世纪, 雅典许多最显赫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触犯法律或遭流放, 或被罚款, 或被处死。

2. 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公民大会、议事

会萌芽于氏族公社时期。公民大会作为最高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 由城邦年满 20 岁的公民组成, 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收入与开支, 决定宣战与媾和, 缔结或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 如执政官抽签和 10 将军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进行[6](P 261)。500 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也是最高行政机关, 负责为民众大会准备议案, 主持民众大会并执行其决议票, 还负责管理财政、外交事宜, 监督国家行政部门的日常事务。

3. 陪审法庭是最高审判机关 陪审法庭是梭伦立法改革时创设的, 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雅典城邦设立了 10 个陪审法庭, 平均每个法庭有 500 人, 由年满 30 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员, 任期 1 年, 不得连选连任。陪审法庭是国事罪、渎职罪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级, 同时也是其他法院判决案件的上诉审级, 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 并有监督公职人员、考核政府官员的权力。法庭通过复杂的程序抽签选出陪审员, 采用开庭方式审理, 在原被告辩论后, 由陪审员秘密投票, 得票多者胜诉。陪审法庭的判决为最终判决, “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权力。”[7](P 49)

4. 轮流执政制度 雅典人认为, “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 also 做被统治者, 这才合乎正义”[3](P 167), 因而雅典实行普选制, 雅典公民轮流执政。伯里克利说, “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 他就会受

收稿日期: 2002-04-10

作者简介:蒙振祥(1960), 男, 陕西兴平人, 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 叶晓川(1977), 男, 浙江永嘉人, 西北政法学院硕士, 主攻方向为法制史。

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2](P 209) 500 人议事会议员、陪审员、一般行政官员,由公民大会用抽签方法选出,任期一年。作为 500 人议事会下设机构的 10 将军委员会和 9 执政官由各部落分别用举手表决和抽签方法选出,任期 1 年。除将军外,任何人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职务,也不能连续两次担任同一职务。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所有公民不会因一些小的过错而被剥夺政治权。”[8](P 5) 亚里士多德估计,每年 6 个雅典公民中就有 1 人可能担任某种官职[9](P 69),“雅典公民的三分之一,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10](P 215) 无怪乎亚里士多德得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3](P 139) 的结论来。为了保证家庭贫困的公民能够参政,伯里克利打破雅典公民担任公职无报酬的传统,实行公职津贴制,即包括陪审员、议事会议员和执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给予膳食费,后来发展到参加公民大会也可以领取津贴[8](P 5),甚至出席观看城邦组织的戏剧表演也可以领取“观剧津贴”。

5. 严格的监督制度 (4) 在雅典,官员从当选到卸任,都要接受公民的严格监督。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7](P 49)。审查内容包括人品、有无纳税能力、是否尊敬父母、崇拜神或圣物等。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 500 人议事会审查,如有问题,则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即复职。”[7](P 64) 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某个管理者贪污或者受贿,就送交法庭裁决,如果法庭判决他有罪,通常就对其课以贪污和贿赂款额 10 倍的罚金[11](P 39~49)。(3) 不法申诉制。它是在阿菲埃尔特(Ephialtes) 执政期间采用的,即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反宪法,就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要求予以修改或废除。在陪审法庭审理此控诉时,该项法令便暂停实行,如果陪审法庭对该法令作出否定性的裁决,该法令便被撤消。(3) 贝壳放逐法。它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中最富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实施的。每个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的方式提出是否有需被放

逐的人。如果有,那么就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每个人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的人的名字。投票数目超过 6 000 则被放逐国外为期 10 年,但其财产不被没收,期满返回,便享有其财产权,以前其他的一切权利也随之得以恢复。

二、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和贡献

1. 雅典民主制形成的主要原因 地中海是一个商海,雅典是地中海的一颗明珠。雅典能踏上世界历史上顶级的民主制度的阶梯,首先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位于希腊中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有着拜里尤斯天然良港,同时雅典又处于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埃及和西亚的交接点上,其地理位置特别有利于发展海上贸易和工商业。另外,雅典的银行丰富,能够大量制造银币;雅典还盛产陶土,所产陶器远销埃及和意大利,这些都使雅典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由商品经济产生的商品关系只能是一种平等关系,平等必须自主,故体现价值根本属性的商品经济必然是平等、自主、竞争、开放的非平衡动态经济。这种经济造就了雅典奴隶制工商业比较发达,工商业贵族的政治势力比较雄厚,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产生体现自主、平等的民主制度。相对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雅典多山的地形,肥沃土壤的缺少和梭伦改革对土地集中的限制,使雅典掌握土地的氏族贵族势力较弱,极难形成君主专制。其次,雅典在多次的政治革命和立法改革中,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削弱,工商业主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梭伦到伯里克利的 4 次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主和劳动群众利益的政策措施,并逐步构建、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再次,雅典从苏格拉底开始,德谟克里特的自然派哲学理论开始演变,雅典哲学研究的方向主要在个人本身与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这就给人民参与民主运作提供了哲学基础。复次,希波战争的胜利,使希腊自成为一个经济活动整体,其中心就在雅典。贸易中心的位置使雅典一跃成为希腊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这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主制度。第五,雅典是一个城邦国家,始终没有形成统一中央集团制国家,祭司集团的影响也比较小,这必然会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雅典民主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障碍。第六,雅典的科学文化繁荣昌盛,在哲学、政治、法律、文学、音乐、美术、历史、雕塑、体育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有着灿烂的成就,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也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2. 雅典民主制的主要贡献 雅典的民主制度最典型、最完善,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的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民主制度,其思想渊源和政体渊源都可以溯源到雅典的民主制。在希腊文中,民主是由人民和权力两字合成,意为人民的统治,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文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希腊文民主一词演变而来。其次,雅典民主制能够唤起公民的参政积极性以及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感。在这方面,马拉松战役中腓力彼得的长跑[12](P 287)以及萨拉米战役的团结精神[12](P 297)可资佐证。再次,雅典民主制是对当时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奴隶主专制国家形态的成功反动,这不能不说是其伟大之处。复次,雅典民主制确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信念,并影响至今。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可以说是在对雅典民主制合理改造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民主依然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信念为核心。第五,雅典的民主政体被后人称为平民政治,这意味着广大普通公民在雅典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并把字面上的民主制变成了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人的民主制变成了全体公民的民主制。第六,雅典的民主制度造就了雅典社会的高度文明,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的繁荣和昌盛,使雅典成为了欧洲古代文明的中心。

三、雅典民主制的局限

1. 直接民主制的缺陷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制。“所谓直接民主制,指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重合,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是通过中介或代表。”[13](P 209)实行直接民主制,“除非是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连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14](P 128)雅典是一个城邦国家,也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其面积不过 2 556 km²,人口在雅典帝国全盛时期也不过 40 万人左右。”[15](P 329)因而“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10](P 72~73)。但是,“直接民主由于常常诉诸全国性的表决和集合,其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容易造成社会的过度政治化,政治压倒一切。”[13](P 208)从而“造成政治肥大症,

导致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衡,使其他机制或功能成为多余,并形成经济萎缩症。另外,它还灾难性地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不能从重要信息中筛去琐碎的噪音和从长远需要中筛去眼前的一时兴致。”[16](P 316~318)“可以说,希腊人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民主,一种公民大会式的民主,一种乡镇会议式的民主”[17](P 113),因而“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具有创新的,但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则被全盘抛弃了”[17](P 15)。

2. 民主制下事实上的不自由 (1) 雅典的公民以政治为本,家庭、财富、亲朋、各社会团体,皆居其下。“一个雅典公民是不会因为照顾自己的家务而忽视国家的,即使是那些忙于业务的人也都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观念,只有我们才把那些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仅看作是无害的人,而且看作是无用的人。”[17](P 33)梭伦立法改革甚至规定不关心政治的人将丧失公民权。这其实是“变相地剥夺了个人处理其私事务的自由权”[13](P 208),造成了人事实上的不自由。比如,为了达到法定出席人数,雅典的公民就经常被警奴用浸过湿漆的鞭子赶往公民大会会场[19](P 344)。(2) 雅典的选举采用抽签制,人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由选择公职,这无疑是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择业权。(3) 在雅典,“个人实际上不受保护,并且任由集体摆布。那种民主随时都在怀疑个人。它对杰出的个人尤为猜疑,对个人的评价反复无常,对个人的迫害冷酷无情。因为它不允许一个公民比其他公民更优秀,在这种制度下,个人的地位总是危在旦夕,一夜之间可能从最高自由堕入最苛刻的奴隶状态。”[16](P 321) (4) 雅典民主制不保障公民的言论、信仰自由。伯里克利时代通过了教士奥菲特斯提出的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有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立即治罪”。根据这条法律,一批优秀哲学家、科学家受到陪审法庭的错误判决,如阿那萨哥拉以“渎神罪”被驱逐出境,普罗塔哥拉被控为无神论者而遭驱逐出境,戴阿哥拉斯因诽谤天神被判死刑,苏格拉底以“慢神”和“蛊惑青年罪”被判处死刑等,这些都成了雅典文明的耻辱。

3. 民主主体的狭隘性 “在民主统治的国家里,公民范围除了暂住居民和证明不能照顾他们自己的人们以外,应当包括一切服从法律的人们。”[17](P 85)虽然雅典公民形式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

公民在当时人口总数中仅占极少数,“妇女不是公民^①,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以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10](P 73)伯里克利时法律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公元前431年,雅典全部居民人数约40万人,而享有公民权的人数只有4.2万人,只占全体居民总数的1/10左右[21](P 178)。“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民主体制内在地就是一种权利体制。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种建筑材料。”[17](P 56)而作为其他民主权利基础的公民权的狭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实质上仍是奴隶主阶段专政的一种形式,国家政权始终把持在奴隶主阶级手中。

4. 民主制度实践上的局限性 雅典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民主,但它却不能保证全体公民权利的正常行使。参加民众大会的雅典公民虽然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但是要求农民不顾农时,放下农活,手工业者停工放弃生产,每隔10天左右就得前往雅典城郊广场去开大会,这在实际上是难以行得通的。另外,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帝国已经形成,为了和斯巴达一决雌雄,伯里克利经常派出军队侦察或打击伯罗奔尼撒同盟,这部分军人出席公民大会的机会就要减少;雅典向同盟国大量派驻屯田兵,镇守同盟国,这部分屯国兵也不能经常出席公民大会。同时,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言顺序已成定式,往往要论资排辈,最先发言者一般是职位高的人,他的发言也最具有权威性,然后是年龄较高有威信的长者[22](P 558)。至于一般百姓的发言,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呼应,恐怕很难有什么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对出席公民大会便不太感兴趣。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1/5左右[19](P 185)。因此,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针对富裕的有闲的少数奴隶主的民主。

5. 选举制度的原始性和不彻底性 (1) 雅典的抽签式选举制度忽视了对不同公职的特殊要求,也不利于人们特长的发挥。这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甚

至带来危害。苏格拉底(Socrates)就曾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因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用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家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9](P 67)(2) 虽然公职津贴制保证公民有出任一般行政公职之机,但是最重要的、掌握实权的将军是无报酬的。于是能够担任该职的必然是富有者或上层分子,贫困者、下层群众为生活所迫不敢问津,实际上被剥夺了这方面的权利。在雅典,将军可以连选连任,这样,将军成了指导国家国防、外交等重大政务的终身职务。因此,“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5](P 159)

6. 监督制度的困境 在国家政体之中,雅典没有成立专门的行使监督职能的监察机构,主要通过公民大会、不法申诉制和贝壳放逐法进行监督。

(1) 公民大会及议事会实行多数决定原则,在实践上容易成为政客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一种工具。经过能言善辩的野心家的煽动,“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的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的利益”[23](P 49),造成“多数人的暴政”。这种多数往往只是众意而非公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曾指出:“公意和众意之间经常有着很大的差别。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14](P 81)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②,雅典西西里远征全军覆没便是公民大会被野心家阿尔基比阿德斯蒙骗的结果。统治集团和一些野心家,经常在议事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和信任投票时发表煽动性和欺骗性演说,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2) 就不法申诉制而言,陪审员都是普通公民,多数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加上当时法律不完善,许多案件只能依靠个人主观判断,这样的投票结果有较大随意性。而且当时没有律师,判案的根据是原告的控诉和被告申辩,陪审员在开庭前不做调查核实。不善言辞者时常败诉。法庭的判决又为最终判决,这样雅典的不法申诉制往往成为奴隶主上层分子监督民

① 在雅典,妇女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资格参加城邦的任何政治活动;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妇女的仪表举止受到法律严格的规定;妇女从出生到死亡始终处于被监护的状态,没有婚姻自由。参见[20](P 188-199)

② 这种蒙蔽有时候是一种受利益诱惑而产生的自愿行为,如中国近期大量报道的贿选案以及“村民被逼选劣迹人”案;若个别野心家通过贿选成为“人民公仆”或村民迫于无奈选出了“劣迹人”,“多数人的暴政”便成了现实。相关案例参见《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5日第2版;《南方周末》2001年10月18日第1版等。

众大会活动,推翻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决议的工具。
(3) 贝壳放逐法规定达到 6 000 票就可将该公民驱逐出境,这同样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在实践中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设立贝壳放逐法的原意在于防止僭主政变,但希波战争后,僭主政变的威胁实际上不再存在,贝壳放逐法成了党争的工具。

四、结 语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古代民主政治之顶峰。它关于国家大事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决策采取多数决定原则,政府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并受公民监督,公民有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和司法独立、崇尚法制的精神,的确为近代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实材料,也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最早的基础。虽然雅典的民主制度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一种形式,但从历史角度看,在生产能力相当低下的奴隶制社会,少数人民主权利的的实施,必然要建立在剥削众多劳动人民血汗的基础上,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雅典的民主制度比起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体和东方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毕竟是进步的政治体制,他们所确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毕竟反映了人类追求民主、追求进步、追求自由的美好心声。雅典民主制的阶级局限性和不完善之处也是在所难免,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雅典民主政治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才能充分认识它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 [法]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

1996
[5]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M].日知,力野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8] Jones A·Athenia·Democracy·Cambridge[M].1978
[9] 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 顾准.顾准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1] 任寅虎.古代雅典民主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 李天佑.古代希腊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
[1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8
[14]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 Hammond N·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Cambridge, 1967.
[16]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17]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8] [美]G·H·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9] 王楷模.现代政治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0] 宋慧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21]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编.世界上古史纲(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2]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3]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辑 刘 欢]

The Direct Democracy And Its Limitation

——Take The Athens As an Example

MEN Zhen xiang, YE Xiao chua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The Athens is the cradl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cept that "Sovereign power lies with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is ruled by turns". The Athenian democracy has its historic advantages as well as its inevitable historic limitation.

Key words:The Athens; The country of city; Democracy; The direct democracy